

文学史方法论

主编 / 钟优民

文学史方法论



主编 / 钟优民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研究课题

文学史方法论 WENXIESHIFANGFALEN 钟优民 主编

责任编辑:郭俊峰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36号)

12.125印张
280000字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册

定价:17.00元

主编简介：

钟优民（1936—），湖南武冈市人，苗族，1962年毕业于吉大中文系，1972年入吉林省社科院，任文学所所长、院咨询委员等，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职。1985年晋升研究员，系省“突贡”拔尖人才，1992年颁给一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1993年应邀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到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正大学等校中文系讲学。长期来在陶学、六朝文学和文学史方法论等学科领域从事综合探索，曾独立主持“七五”、“八五”两项国家课题研究。主要著作有《陶渊明论集》、《陶渊明传》、《陶学史话》、《曹植新探》、《曹子建传》、《谢灵运论稿》、《望乡诗人庾信》、《社会诗人鲍照》、《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中华诗歌精萃》（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卷）、《新乐府诗派研究》、《清实录文化资料摘编》（主编）、《新时期学术思潮》（文艺卷主编）等十余部及相关论文百余种，其中五部分别由国际文化、文津、允晨、广文等四家台湾文化公司出版。其事迹被收入《国际当代学术名人录》（英国剑桥）、《中国社会科学大辞典》（英文版）等多种中外学术信息库。

序

钟优民等同志编著的《文学史方法论》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文学史方法的严肃的学术专著，它的问世将会填补文学史理论研究中这块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领域。因此，我热情推荐这部书稿，并期盼它能早日出版。

该书稿的作者是在广博的六朝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事这一创造性劳动的。文学史理论是新时期来才引起论坛重视的新课题，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文学史研究个性的觉醒和理论探索的深化，作者基于丰富的文学史研究体验，较早地意识到文学史方法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价值，开始这一无所依傍的探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史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该书稿特色之一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作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科学而包容性很大的文学史方法理论的构架体系，其中包括作为该体系的理论基础（科学方法论）及其一系列基本范畴（如论与史，宏观与微观，自然时序与逻辑时序，基础、视角与单位、历时性与共时性等），并借助范畴去把握文学史研究各个层级上的本质和各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它们构成该学科井然有序的完整理论体系——有机系统。这是相当富有胆识和新意的探讨。这之中展开的文学史方法论体系虽属草创，却对该学科的建设具有重大启迪意义，可以帮助文学史家突破以往

那种较为单一、封闭的研究模式，为文学史研究开拓广阔生存空间，焕发新的活力。

该书稿又一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内涵十分丰富。全书稿中既有对千百年文学史研究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概括，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绝非那种脱离文学史研究实践的思辨公式；又是贯穿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开放体系，其中包含对近代西方文艺学一些已有的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的吸收与借鉴，并在注意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将其加以必要的改造而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像《新方法 with 文学史》（上、下）两章所展示的，力图在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富有时代精神、更趋完善的文学史价值评判体系，这种深邃的理论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

我深信对于像这样一部具有草创和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是能得到出版社的扶植和读者的欢迎的。

张松如

1992年3月24日

目录

序	张松如 (1)
导言	(1)
一 文学史方法论的性质与任务	(2)
二 文学史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8)
第一章 方法与实践	(15)
第一节 方法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15)
第二节 文学史方法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24)
第三节 文学史方法论与文学史观	(30)
第四节 方法论与具体方法	(39)
第二章 史与论	(46)
第一节 主体与客体	(46)
第二节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58)
第三节 当代意识与历史意识	(68)
第三章 宏观与微观	(83)
第一节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83)
第二节 宏观与微观的互补统一	(93)
第四章 史实梳理——全景再现	(103)
第一节 基础、视角、单位的最佳选择	(103)
第二节 点、线、面的合理安排	(129)

目录

第三节 还历史本相的困惑与出路·····	(145)
第五章 自然时序与逻辑时序·····	(161)
第一节 历史分期的论争·····	(161)
第二节 历史分期的原则·····	(175)
第六章 历时构架与共时构架·····	(186)
第一节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186)
第二节 构架的多样与创新·····	(196)
第七章 传统方法与文学史·····	(211)
第一节 方法的多元走向·····	(211)
第二节 历史批评与文学史·····	(220)
第三节 社会批评与文学史·····	(232)
第八章 辩证方法与文学史·····	(245)
第一节 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245)
第二节 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的有机结合·····	(25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与文学史·····	(266)
第九章 新方法 with 文学史 (上) ·····	(284)
第一节 比较文学与文学史·····	(284)
第二节 接受美学与文学史·····	(300)
第三节 结构主义与文学史·····	(312)

目录

第十章 新方法 with 文学史 (下)	(325)
第一节 心理批评 with 文学史	(325)
第二节 神话原型批评 with 文学史	(339)
第三节 系统方法 with 文学史	(353)
第四节 新方法及其实践	(368)
跋	谷云义 (374)
后记	(376)

导 言

文学史方法论，这门正在崛起、大有作为的新兴学科，以其独特风姿神韵、迈着矫健的步伐向读者走来，为论坛增添又一交叉学科，实为文学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以及莘莘学子额手称庆、不胜企祷之盛举。

在数千年的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灵智总是不断进步，科学水平更是不断提高，因而认识能力、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在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近代科学方法论就是探讨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关于方法的理论。科学发展的历史反复证实，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往往与科学方法、手段的重大革新相联系，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日益成为科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广义的科学方法论不仅要探讨科学认识的一般过程，获得信息和科学抽象的方法，而且要研究有效的和正确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狭义的科学方法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研究程序的探讨，以寻找正确的程序，防止研究方向与途径上的偏差；一是描述与论证研究方向的可行性，以辨别何种方法适用于研究，何种方法只是部分适用乃至完全不适用于研究。文艺科学领域亦不例外，在文学艺术发展的漫长里程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也有与之相适应的文艺观念、文

艺批评和研究方法，从总体考察，这种观念与方法同样是由初级到高级不断演进，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当代文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文艺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各种新方法不断涌现，色彩缤纷，当代文艺研究方法热潮在寰球此伏彼起，持久不衰，令人目不暇接，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尔后，这一发展趋势还将沿着更为深广、健康的方向拓展，锦绣前程，无限美好。

一 文学史方法论的性质与任务

何谓文学史方法论？首先需要“释名以章义”（《文心雕龙·序志》），简而言之，它就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独特的思维原则、方式及其规律。众所周知，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认识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共存一体、并行不悖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文学具有重要教育作用，它以连续积累、异彩纷呈的成果，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文学更是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自己的特色，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民族英雄，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见文学史的研究是一项继承人类文明遗产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文学史作为人类文明社会极为复杂的精神史，它是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网络动态系统，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史；就其与人的关系而言，它是表达创作主体心灵、情绪和人类文化进程的语言艺术发展史；就其外在形态而言，它是描绘各种审美理想、美学情趣的形象发展史。文学史的特殊性是以文学的特殊性为基础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文学。文学史是以文学演变为对象、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是文艺学与历史学

结合的交叉学科，其主体是由客观存在过并积淀下来的诸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体裁的多种形态、创作个性、风格、流派、思潮、类型原则、创作规律等）构成的历史性的演变过程，它首先属于“史”的范畴。文学史著作、教材是历史范畴的表现形态，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系列化、系统化，侧重纵向探讨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轨迹和规律，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学史方法论则属于“理论”的范畴，作为理论形态的概念系统，它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解释，前者主要指文学史学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一系列方法，后者则包括文学史学全部丰富内涵，一部文学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史方法发展的历史。本书侧重第一种狭义的概念，其重点是横向探讨文学史研究方法与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新方法、人文科学各学科方法的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讨正确运用方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参照系统和操作过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宽广的宏观视野和较强的思辨能力，对以往各种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特点、性质、作用、局限加以总结和梳理，以建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与逻辑性的、并充分体现学科特征的理论体系。一般地说，当代各种新学科体系的产生不外乎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原有学科因研究之深入而派生出分支学科，如从中国古典文学里近代陆续分离出“诗经学”、“楚辞学”、“陶学”、“文选学”、“雕龙学”、“李杜学”、“红学”等；一是因不同学科相互渗透、彼此补充而结合出边缘学科，如文艺学与心理学交叉而形成“文艺心理学”，人类学与文化学交叉而形成“文化人类学”，信息论与美学交叉而形成“信息论美学”等。文学史方法论的产生，则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结果，这一学科特征要求其研究者，应该既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家，又是一个合格的方法论专家；其从事文学史研究实践时能够自觉地运用其所倡导的方

法，又能够通过实践总结、概括新方法及其原则，以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原有方法论体系。

文学史方法论的任务与其研究对象密不可分，它包括探讨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探讨文学史方法与实践的关系，探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探讨传统方法、唯物辩证方法、“新方法”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文学史方法论范畴，如史与论、宏观与微观、史料梳理与轨迹勾勒、全景再现与规律总结、自然时序与逻辑时序、历时构架与共时构架等等。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范畴，并借助范畴、概念去把握该学科各个层级上的本质——网上纽结。文学史方法论与各种学科一样，各种要素和各个层级互相交织而形成一张复杂的网，每一范畴就是这网上的一个纽结，文学史方法的理论体系就奠基于一系列范畴之上。通过这些范畴的历史反思、爬梳和阐释，探讨文学史方法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总结不同研究方法的区别、联系及其所服从的基本逻辑。上述各项任务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都是文学史方法论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它们共同构成本学科较为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机系统。当然，这一体系并非脱离古今中外各种文学史研究实践的思辨公式，而是贯彻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原则、不断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手段予以丰富的文学史方法论的开放体系，从而使其永葆生命活力而趋于日臻完善，以充分发挥其工具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成为文学史家的良师益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极为丰富的方法论内涵，从它们诞生之日开始，就指引人们拨开被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深层，使文学史研究第一次获得最好的方法论武器。众所周知，方法论不是人们主观任意编造的法则，它

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和根源。文学史方法论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系统的思想来确定自己的认识方法与研究手段,还要批判地吸取当代西方科学的优秀成果,努力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选择实例予以概括、总结,并且注意展望世界文学发展的未来对方法论的影响以规范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恩格斯讲过,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和对应物,方法论不仅仅是方法论自身的问题,它的本身和影子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挖掘和对应,方法只有在与对象本质特征相符的条件下,才能在加深其对象规律的揭示中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因而文学史方法论的建构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和研究文学史的本质与规律,为文学史的深层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列宁曾经指出:“遵循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迷雾的巨大穿透力,连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深表赞叹,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系列原则:实践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量变到质变的观点等等,都是文学史方法论赖以建构的支柱和灵魂,而不能将它们视为与诸如社会学方法、系统方法、心理方法、文化学方法等一般科学方法论处于同一等级地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是任何其他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思维形式所不可比拟或等同的,更不用说以之取代了。无数铁的事实表明,社会科学若背离或淡化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作用，难免误入歧途，这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史家的共识。因而对于那种可以称为“三分天下”的观点是难以苟同的，他们声称当前中国实际上是官方意识形态、西方工具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维持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并断定“无论哪一家想一统天下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细究起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三分天下”就是认为三种文化不分主次，平分秋色，各领风骚，将三者之间互补统一的实质加以曲解，这种表述是极不严肃的；同时将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与“西方工具理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三者截然割裂，也与客观现实大相径庭，当代人们坚持弘扬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元与多样有机统一的综合文化，而非一元与多样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单一文化。我们虽然不同意以多样排斥一元，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但它并没有给文学史研究提供任何现成的教义或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并非就可以不必再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只要在研究中照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或到处乱贴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象恩格斯所多次告诫的某些人的幼稚做法，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我们应该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作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光辉论述，为人们“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方法论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可是马克思历来却不赞成对这种不

平衡关系“作一般的表述”，不赞成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去理解任何一种历史范畴，不赞成把一切历史差别消融在一般规律之中，以免闯入历史研究的误区。

文学史方法论作为理论形态的概念系统，应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去总结、概括文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辩证规律，建构文学史方法论的独特体系，并在研究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以丰富、完善之。但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将它搞成封闭的体系或僵死的教条，文学史家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理当以阔大开放的眼光和包涵万物的胸怀，广泛汲取中华民族传统的久经历史检验、行之有效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以及国外进步的文学史观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提出丰富、多样的方法论原则和模式，以规范文学史的深入研究；还要借鉴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各种新方法，探讨学术前辈未曾运用的特殊视角和方法，如以动态结构的理论架构去贴近文学发展的深层，作为文学史的支撑架，将各种文学现象放在动态、整体形态中予以考察和描述。为此，需要开展一系列深入的专题研究，如“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接受美学与文学史”、“结构主义与文学史”““文化人类学与文学史”、“心理批评与文学史”、“神话原型批评与文学史”、“系统方法与文学史”、“符号学与文学史”等项目，通过这些探讨进行必要的方法论训练，并从此出发，进一步开拓思路，深化文学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

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建构与文学史研究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本学科赖以确立并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主要目标。为此，本书力求比较具体、有选择地介绍中外文学史领域各种主要研究方法的起源、内涵、流派及其性质、特点、价值，并从文学史编写的丰富实践中选取某些事例，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说明各种方法的独到与不足，以便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

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从更普遍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文学史方法论的意义，并以之运用于研究实践，检验其生命力及其合理存在的价值。总之，文学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草创伊始，筚路蓝缕，奠基维艰，且任重道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完全依靠当代学者去走完这艰苦的里程，故肩负此重任者必须有足够思想准备，这“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面对历史的赋予与召唤，只有毅然投入，奋勇拼搏，方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二 文学史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纵观自古至今的学术发展史，举凡新观念、新方法的诞生，皆基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客观现实的需要，文学史方法论的问世，同样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众所共知，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皆离不开方法、手段，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就是能力，方法带来智慧，方法使人聪明，一切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方法的选择与革新。梁启超曾经说过：“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后从旧方法中，开发新方法来，方法一天天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饮冰宣文集·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尤为重要，方法的水平标志着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恩格斯在与形形色色的学者论争时，其辩证方法的巧妙而又灵活的运用，所向披靡，使其敌人无不为之赞